看·世界遺产

聚焦2020年福州世界遺产大会 ——

中国的遗产数量还会继续“第一”吗？

燕海鸣

2019年即将过去。

2020年，第4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将在福州召开。这是继2004年苏州大会之后，中国第二次举办世界遗产大会。和16年前相比，福州大会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遗产事业而言，意义都有不同。如果说苏州大会是世界遗产对于国人的一次启蒙，让我们认识了世界遗产；那么福州大会则将展现一个世界遗产大国的使命与责任。我们将以真正的国际视野，不仅讲述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更要观照世界的故事与命运。

我们希望，当国人关注、谈论福州世界遗产大会之时，不仅聚焦中国的项目、中国的数量，也要以超越国界的眼光，观察和关心其他国家、地区世界遗产的种种。作为东道主，作为世界遗产大国，我们将以什么心态迎接福州？又将以什么样的预期准备这届大会呢？在此为大家提供若干观察福州大会的切入点，这些议题看似比较具体，但都反映着世界遗产领域的重要趋势。

当然，国人最为关心的信息，还是中国的“第一”还能继续吗？

目前，中国与意大利目前均以55项遗产位列数量第一。很多人都希望这个第一保持下去，要回答这个问题，应该了解两个事情：一，世界遗产申报的数量限制机制；二，意大利对于“第一”的重视程度。

首先，最初申报数量是没有限制的。但由于欧美国家几乎统治了世界遗产名录，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为了平衡各大洲的遗产数量，实行了严格的数量限制。到2018年之前，基本上是每个国家每年最多申报2项。2019年之后，缩减为了1项。如果是这样，那么中国和意大利今后一直会并驾齐驱。但是，这个数量限制模式有一个例外，即：如果是多国联合申遗项目，可以只占用其中一个国家的名额。也就是说，从策略上而言，如果要申报更多项目，就应该申报更多和其他国家联合的遗产。

意大利作为世界遗产项目常年排名第一的国家，对“第一”的名号非常看重，尤其是当中国追上之后，会更加关注每年申报的数量。根据世界遗产中心公布的信息，2020年大会上，意大利将有一处单独申报项目，一处联合申报项目。相比而言，中国则只有泉州一处项目。意大利会有较大概率重新“夺回”世界遗产“单独第一”的荣誉。而且，考虑到意大利相对灵活的地缘优势，更容易和周边的欧洲邻国联合申报项目，因此今后若干年内，意大利每年申报项目的数量很可能都大于一。

因此，中国在世界遗产第一位置上的时间，可能只有一年。不过话说回来，我们践行《世界遗产公约》的目标也不是为了争第一，而是以世界遗产大国的心态，不断提升保护管理的水平，力争成为世界遗产强国，传播中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

（作者系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ICOMOS CHINA）秘书处主任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研究员）

聚焦自然资源部成为IUCN国家会员代表 ——

加入IUCN 对中国自然遗产领域的影响

齐 欣

日前，自然资源部简单地发布了一个重要信息：“经批准，自然资源部成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国家会员代表。”

IUCN与ICOMOS（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同为世界遗产进行评估的官方技术支持机构。

在文化遗产领域，我国与ICOMOS已经融合多年。1993年中国加入ICOMOS，同时还成立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委员会（ICOMOS China）。中国专家已多次出任ICOMOS的副主席或执委，积累了有效的双向交流经验，逐步有了表达自我、服务世界的态度与方法。中国与IUCN的合作虽自上世纪70年代已经开始，但形成效果和规模尚需时日。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在同样的框架下，将中国的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领域放在一起，相互比较、相互借鉴了。

只要将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并肩观测就不难发现：目前“自然遗产”带给社会公众的信息尚明显少于“文化遗产”；也就是说，自然遗产及管理者给人的印象似乎更严肃、不活跃，没有使用和表达出世界遗产蕴含的那种澎湃、那种冲击人们内心的张力；自然遗产地也就更像保护区而不像“公园”。

在自然保护领域，科技交流共享是专业问题；但换个角度，在世界遗产视角下，共识与共赏，则进入了文化范畴。

自然遗产，会更“文”一些吗？

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自然保护地是生态建设的核心载体、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美丽中国的重要象征。”在“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理念统筹下，国家公园体系正在对交叉重叠的自然保护地进行优化整合。但这种整合并非简单的行政管理变革，一定会促进价值承载区域与人的精神需求间形成清晰的交流空间和传播平台。这是世界遗产的趋势，也应是国家公园体系的重要愿景。由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的比较，进而到自然遗产对应的各类自然保护地，可以看出其发展方向将逐步与社会共享贴近。贴近意味着活跃，也就意味着增加文化形式与比例。此时，自然遗产会出现“文化化”现象。

这对自然保护地体系的知识结构和人员自身素质结构，都提出了挑战。

在展出了两个多月后，中国“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于11月末终于落下帷幕。展览引来了大批文博爱好者和社会公众的关注，展期都延长了。

不只让你看热闹 还想引人想得更多更远……

一个小环节 意味着新变化

田姬熔

意大利政府返还的汉代陶俑。（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闭展前一天 仍人头攒动

中国“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取名“回归之路”。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精心挑选出25个文物回归故事、600余件文物展品，引领观众“重走”70年来文物追回的艰苦和精彩历程。

在展览预计结束前3天，也就是11月13日，港澳爱国企业家何鸿燊将自己收藏的圆明园马首铜像捐赠归国。展览为此特地延长了10天。在展厅内，马首与其他6尊兽首铜像一同展于圆明园海晏堂背景墙前。

尽管展览已经接近尾声，但闭展前一天的展厅内依然人潮涌动。公众对此次展览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关注。

在展区入口处，7尊兽首依次排开。新回归的马首铜像位居正中央，成为当之无愧的焦点。由于慕名前来者众多，展厅专门开辟了参观通道，等候队伍排到场外，大家在马首前驻足、合影，也不忘拍下这难得的热闹场景。

作为中华文化精品，唐代韩滉的《五牛图》和东晋王珣的《伯远帖》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众人“捧月”、排队瞻仰的待遇，人们围着展柜仔细品评，听讲解员讲述珍贵文物回归的曲折历程。虽然10月17日以后，展览均以复制品示人，但观众观展的热情丝毫未减。

文字说明 与以往不同

这次展览中，有一些细小的变化，显示出展览设计者全新的价值阐释思路。

此次展览中展出了圆明园兽首、“乐威毅公祠”铁钟、义和团旗帜，这些文物的回归，既铭记着中华民族在积贫积弱时受外族欺凌的历史，又展现了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壮丽篇章，它们的展出能够激发当今人们的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具有重要教育意义，这正是文物社会价值的体现。于是，这次展览中的价值阐释说明，更多地表达出“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

来自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的陈昀，曾经参与此次“回归之路”展览的展品说明撰写工作。据他介绍，以前做文字说明时，只要从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角度来进行阐释就可以了，也就是说明何时何地发生过什么。但这次他们更希望从精神、情感层面来阐释文物对现在人们的影响。

在展品说明中加入对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的阐释，正是此次文物说明中细微却很重要的变化。

展品中还有由意大利政府返还的文物和曹其镛捐赠的漆器文物，这些文物体现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后者所具备的精妙工艺更是有着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对于今天的参观者而言，其更多意义在于增强文化自信自觉，于是，展览的现场说明中，有意识地加入启迪文化交流互鉴、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

捐赠仪式结束后，人们在『回归之路』展览上参观圆明园马首铜像。曲俊燕摄

传播理念更新 影响展陈

2015年修订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中，已经将“社会价值”与“文化价值”纳入到文化古迹的价值中。2019年10月国家核定并公布了“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此次申报指南中“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同样成为新标准纳入其中。

在陈昀看来，文物是文化资源。在保护文物的同时，也应该想到如何能够服务社会、服务民生。

对文物精神内涵的挖掘和延伸阐释，不但为展品赋予了深刻的意义，背后更是整个文博行业价值理念的转变：通过增加展品对社会、文化价值的探索，逐渐将展览交流空间内的主角，从“物”换成了“人”。

围绕着“人”，博物馆界“玩”出了更多新花样。陕西历史博物馆结合高科技、多媒体元素，让严肃的历史人物摇身一变换上了能歌善舞的现代面貌，这种生动通俗、便于传播的方式让“国宝”走进了人们的生活。故宫则带头开发出新潮的文创产品，打造出了“故宫淘宝”这个家喻户晓的响亮品牌。敦煌壁画更是跳出莫高窟凝练成敦煌文化，成为了中华文明同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象征。这些探索，与此次展览中以文字说明来演示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都可以看做是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转变和探索。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文物能帮我们还原过去的面貌，这是历史、艺术、科学的价值；文物对今天人们的借鉴和教育作用，这是社会和文化价值。文物见证过去，而利泽当今，找寻人类过去的信息需要在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方面研究和诠释，而发挥对今天社会的有益作用，则需要发掘和利用其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

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主办，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承办的“回归之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集25个案例文物。其在文物类别、数量特征、价值水平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撰写展品说明既要围绕展览主题和服务宣传导向，又要准确介绍文物回归故事和阐释重要价值。在表述上尤其注意文物对当今的教育和启示作用，对民族文化传承和借鉴意义，这是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范畴。

社会价值体现文物在文化知识和精神传承、社会凝聚力产生等方面所具有的社会效益。

展出的文物大沽铁钟，名为“乐威毅公祠”铁钟，是为纪念抗击英法联军壮烈殉国的直隶提督乐善于1884年铸造的。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铁钟被作为战利品掠走，存放在英国朴茨茅斯市。2003年以来，天津市政府通过多种渠道呼吁将文物归还我国。2005年5月，在中英两国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英国议会通过了无偿返还文物的提案，阔别故土100多年的铁钟终于回归祖国。

铁钟的展品说明和价值阐述为：铁钟外壁上段铸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8个大字，体现了在积贫积弱的时代人们对国家太平、人民安乐的祈愿。这口钟铭记着中国人民抗击外国侵略者勇气和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也见证了中华民族由弱变强的伟大历程。

“追古”与“利今”

陈 昀

图为英国返还的“乐威毅公祠”铁钟。（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藏）

文物的文化价值则是体现文化多样性特征和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联系。

此次展览还展出了曹其镛夫妇的捐赠漆器。香港收藏家曹其镛先生和夫人曹罗碧珍女士热爱中华传统文化，醉心中国古代漆器的收藏。2012年和2014年，曹其镛夫妇两次将自己毕生收藏的168件珍贵漆器无偿捐赠浙江省博物馆，补充和完善了浙江省博物馆相关门类的收藏，慷慨捐赠义举令人感佩。

曹其镛夫妇捐赠漆器的展品说明和价值阐述为：这批古代漆器年代跨度从宋元至明清，数量众多、品质精良，既有曾经珍藏于宫廷的官作漆器，也有民间制漆匠人制作的漆器小品。这些文物不仅是中国漆器工艺演进的实物资料，也为后来者创作设计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

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已经产生了体系性的转变，对遗产的价值认知，把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提到与历史价值同等重要的地位。馆藏文物价值阐释不仅涵盖历史、艺术、科学的内容，还应该充分从社会和文化视角判断和评价。

保护文物是对其价值、价值载体及其环境等体现文物价值的各个要素的完整保护。利用文物也要充分发挥文物的各方面的价值，不仅“追古”，也要“利今”，利用好文物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文化生活需要。

（作者系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文博副研究馆员）

图为意大利政府返还我国的文物——新石器时代陶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专家观点

博物馆：越来越强的媒体特性

曹兵武

近年来，博物馆以展示宣传为导向的媒介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博物馆建筑往往被视为所在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即经过人为设计，达到宣示博物馆定位、所在地方历史文化积淀与未来方向的传播意义。同时，博物馆展览已经成为一种高度综合性的媒介，除了传统的展品、说明牌、展柜、展板之外，几乎所有现代媒介形式都被引入其中，展览被整合成一个具有高度综合性和统一性的面向受众的叙事文本或者互动现场。围绕展览的相关活动——图书出版、广告宣传册以及其他传播教育活动也呈现出高度的媒介化特征。

与此同时，博物馆也更加注重其明星展品、品牌展览以及相关活动的传播效应，竭力将其打造成为博物馆自身形象的代表并融入博物馆工作各个环节。当然，馆长网红化——一个博物馆的馆长或者明星馆员、讲解员，会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博物馆的代言人。

实际上，在一些管理者心目中也已经将博物馆定位为宣传机构，重要博物馆、具有高度品牌效应的博物馆和博物馆活动直接被划归政府宣传部门管理以示重视。总之，博物馆的功能定位与机构使命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相对而言，保藏与科研等传统职能的比重在降低，展示传播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在提升。

（作者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